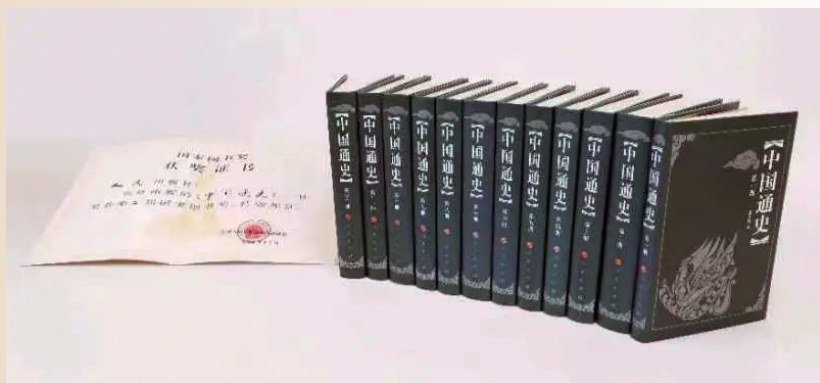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乔还田

范文澜、蔡美彪等著 12 卷本《中国通史》，前后打磨了 68 年，倾注了作者方和出版方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。说到打磨过程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多次与蔡美彪面对面交流的氛围之中。



几代人接力 68 年铸就经典 《中国通史》的出版故事

80 年前的“述往开来”之作

范文澜是史学大师。《中国通史》的前身是范文澜 20 世纪 40 年代写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

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、介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著作。该书在写法上打破了旧的王朝体系，是颠覆性的创新。第一，书中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，而旧史书把帝王将相视为主人。第二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，划分了中国历史的段落。第三，宣传了阶级斗争，着重讲了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。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，着重叙述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。第四，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古代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、手工业方面的知识。第五，赞扬了古代哲人关心社稷、爱祖国的精神。

据范文澜回忆，初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是在延安窑洞中的油灯下完成的，由于缺少参考资料，书中免不了要出现一些偏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范文澜便开始修订工作。在他看来，里面一些属于主观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写法必须剔除。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修改进度，组织上专门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中国通史组，协助范文澜工作。

据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回忆，1958 年夏，范文澜赠给他们 4 个字，即：专、通、坚、虚。所谓专，是说“史集浩瀚无边，一人之力只能专攻一部分”；所谓通，就是要在专攻重点之外，应“注意前后左右，做到直通、旁通”；所谓坚，即指做学问要有信心、耐心和毅力；所谓虚，就是要虚心，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。中国通史组就是根据这四字方针进行工作的。

经过十几年辛勤的耕耘，修订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至第三编（远古到隋唐五代）相继问世，前后有 8 个版本。三编出版后，受到社会的好评，毛泽东曾说此书资料多，让人愿意看下去。1968 年 7 月 20 日，毛泽东还派女儿李讷前去看望范文澜，并给他传话：“中国需要一部通史。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，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。通史不光是古代、近代，还要包括现代。”

对于毛泽东的殷切期望，范文澜感到万分激动。尽管他当时在病中，仍立即着手编写计划。他满怀激情地说：“全书 5 年完成，我还不过 80，不算老。”但不幸的是，仅过了一年，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。受范文澜生前委托，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。在蔡美彪的主持下，30 余名学术底蕴深厚的作者，通过 38 年精心打磨，12 卷本《中国通史》相继与读者见面。学术界点赞这部通史架构宏大、思路清晰，史实准确、观点独到，材料扎实、文笔练熟。



乔还田 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，现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从事编辑工作 40 余年间，策划、组约、主持《中国通史》（12 卷本）、《中国民俗史》（6 卷）等近百种著作。

编辑的实质性助力

这部全面展示中华文明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
2021 年 7 月 26 日，负责拍摄《为人民出好书》电视片的编剧和导演采访了我。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范文澜是史学泰斗级人物，蔡美彪也是史学大家，对于这个级别的名家之作，贵社拿到《中国通史》书稿后是不是一个字都不改？是不是直接送到印刷厂付印了？”我回答：“非也！仅就编辑环节，我们几代人默默奉献，付出很多很多。”导演说：“我对‘非也’的回答很感兴趣。请告诉读者和观众你们所作的贡献，你们付出了什么。这样人们才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、新中国诞生后代号为 001 的‘皇家出版社’是何等的‘牛’。”我回答：从书稿档案、相关材料和其他印迹看，人民出版社自 1952 年以来，有近 30 人倾力投身《中国通史》的编辑工作，至少有 5 个方面的贡献，有些建议可谓是妙策。

一是查核资料引文。范文澜的延安版本是供“解放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”，书中引文没有注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《中国通史》由普及读物升级为学术性论著，资料引文必须注明出处。为此，我社编辑认真查找、核对相关的中国历史工具书，注明了出处，实质性助力范文澜的修订工作。老编辑吕异芳回忆道：“当时胡绳同志是出版社的社长，传说范老写的《中国通史》在解放区很受欢迎。总编辑王子野同志命我们前往联系。范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，我的学友蔡美彪正好调到范老身边，我顺利见到范老，说明情况，范老十分高兴，并指示说‘你们工作的第一步，希望帮助查核材料，纠正引文

等’。拿回稿子以后，发现书中所有材料均无引文出处，查核十分困难。”好在当时历史组负责人朱南铤很有学问，他翻看了部分书稿，说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学会使用历史工具书。于是，他便在每个周六下午教大家如何使用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志》《通典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工具书，从而协助范文澜顺利完成了《中国通史》的第一次修订和补充。

二是聚拢写作团队。《中国通史》原计划共 10 卷。第一至第七、第九卷于 1986 年出版后，因各种因素无法续写下去，停顿了近 3 年时间。其时，蔡美彪多次无奈地表示：作者交来的初稿太粗糙，不是用心写出的作品，对提出大的修改、调整意见，又不情愿配合，只能顺其自然，《中国通史》有可能变成“半拉子”工程。面对这一窘境，我社没有放弃。

三是进行全书修订。10 卷本出齐后，我主动提出对全书进行修订，并推出特装本。我社编辑参与了对范著前四卷核对资料、校正文字工作，还编选了大量图片，并明确要求增加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。我们认为，增加索引便于读者检索、查找，这是国际惯例，否则学术著作很难走出去。

四是补写两卷图书。10 卷本《中国通史》于 1996 年 1 月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。但其内容只写到清朝嘉庆年间，可以说“通史不通”。于是，我提出应该补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。理由是：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推翻了“洋人的朝廷”，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，完成了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变。我与蔡美彪反复研讨、商量，并且推荐了部分作者，加写的第十一卷、第十二卷于 2007 年出版。

五是做好作者服务。我们始终服务好蔡美彪这位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。自蔡美彪承担起主持《中国通史》续写任务后，我便派编辑常去蔡美彪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办公室就书稿进行沟通。近十几年里，书稿事宜虽不多了，但我们一直坚持每年去蔡美彪东总布胡同的家里坐会儿，有时是因书稿进行请教，更多的则是看望一下他老人家，单纯地聊聊天。但不管是哪一种交流，睿智儒雅、学养深厚、思维敏捷、淡泊名利、有大家风范的蔡美彪，从社会新闻、学术动态，到故友情况等，聊天内容都给我们满满的鼓励和指点。

业界人士都知道，编辑工作有四大职能：第一是评价，判断一个文化产品是好还是不好；第二是选择，选择优秀的文化作品或选择文化作品的优秀部分；第三是优化，对决定出版的文化作品进行优化，使其达到出版水平，能够高质量地在大众中传播；第四是推荐，用各种手段向大众推荐我们的作品、产品。其中，优化职能最见编辑的功力和水平。而所谓优化，又有两个层次：一个层次是编辑向作者提出整体修改建议，帮助作者整体上对作品进行提高和完善；第二个层次是编辑直接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。

从上述五点看，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出版 12 卷本《中国通史》的过程中，在这两个层面均作出相应的贡献。通常讲，精品力作需要十年磨一剑，而这部 12 卷本的巨著是作者方和出版方用时 68 年共同打磨出来的。

据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